

120

潮州文史資料

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



潮州文史资料

第13辑

(内部资料)

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

1994.11.

· 目 录 ·



潮州文史资料

第 13 辑

• 峥嵘岁月 •

- 潮州工艺美术四十年（二） 林少亮（1）

• 政坛旧事 •

- 国民党潮安县政权概况 马芝济（28）

• 人物述林 •

鳄渚两师别传

- 陈行瑞、陈行成先生轶事 王槐（101）

- 诗文翰墨名家王延康事略 黄梅岑（105）

• 俗事寻踪 •

- 金山中学 1934 年校潮追忆 徐绍谦（109）

- 潮州城潮绣、服装两行业发展管窥 许振声（117）

• 艺苑掇英 •

- 京沪戏剧学院专家论明代潮州戏文、潮剧 刘管耀（125）

- 潮州民间舞蹈——鲤鱼舞简介 施策（128）

- 潮州昆曲班 刘管耀（130）

• 目 景 •

• 名胜古迹 •

- 潮州古城墙记 张志尧 (131)

• 新韩江闻见录 •

- 记潮州城沦陷时期的商旅交通 兆 声 (147)
解放前夕的币制贬值 翁兆荣 (151)
蒋介石在潮州看潮剧 陈俊彝 (154)
“虹桥事件”始末 东 人 (155)

编者·作者·读者

- 《关于潮州古城牌坊的分类及其式微》补遗 陈贤武 (157)
〔来函照登〕 (158)



林少亮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6. 10)

引言

潮州工艺美术工业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关怀下，经过行业中人上下努力，到 1965 年已铺好一条平稳前进的轨道，准备为潮州经济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可是，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使众多涉及文化意识范畴的传统工艺美术品被扣上“四旧”、“封资修”、“复古倒退”的罪名，变成革命扫荡的对象。1967 年 4 月，周总理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对出口工艺美术品的题材问题作了指示：工艺美术品除了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以外都可以生产和出口，要“内外有别”、“区别对待”。但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十分严重，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得到贯彻，许多企业和产品遭逢重重厄运。面对“四人帮”的大破坏，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于 70 年代初力挽狂澜，使几乎毁于一旦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生产渐渐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第一节 政治风云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一、在破“四旧”、“关停并转”中沉没。

潮州工艺美术的命运受到国家政治风云的左右。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千方百计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传统工艺美术产品被斥为是产生“四旧”，产生“封资修”的“毒品”而被全盘否定，统统被扣上“复古”、“倒退”的罪名，不仅企业不准生产，而且大量库存的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工艺美术品被砸烂、烧毁。到处有人煽动停产、转产，大批老艺人受到迫害，潮州工艺美术行业一时生产急剧下降，品种减少，蒙受重大损失。从1966年扫荡潮州开元寺大佛及寺内一切珍贵工艺美术遗物开始，潮州古城拉开了大破“四旧”的帷幕。1967年1月，潮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历年收藏的明清金木雕和潮绣精品，大量的图书相片，被该所主办的工艺美术职工学校部分红卫兵学生强搬集中，公开烧毁。老艺人张鉴轩、陈舜羌等人眼看多年专心收藏的一批粤东地区明清工艺珍品被熊熊火焰夺去，真是老泪纵横，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久，潮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宣告下马。从事工艺美术研究和教学的国家干部美其名到枫洋干校锻炼，以工代干的人员则按各人专长分配到木雕厂、工艺厂、丝衣厂工作。由广东省手工业联社于1963年4月拨款创建的潮州工艺大楼，转眼之间人去楼空，后来变成潮州二轻单车配件厂的生产厂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潮绣被强加上“为资产阶级服务”，“花鸟虫鱼是封建清调”，“龙凤是为帝王后妃唱颂歌”等罪名被勒令停产。库存的部分古装戏服，由汕头外贸公司到厂清查后以6万元买走，出口香港转运泰国、新加坡，通知今后再不生产，以杜绝“封资修”的死灰复燃。样板戏虽到处演唱，但戏服生产批量少，产值低。潮州戏服生产陷入了困境。

“水仙花”牌绣衣，也被扣上为“资产阶级服务”、“为洋人服务”的罪名受到批判。起步不久的潮州丝衣厂和绣衣厂，本来就停滞不前，因出口任务骤减，前景更加渺茫，潮州绣衣厂终于在1968年缺米断炊；丝衣厂虽能苟延残喘，到1971年也终于被迫停产。1958年创制的名牌“水仙花”就这样枯萎了。

金银首饰企业日子更是难过，金银首饰生产被诬为“为封资修服务”，到1971年，首饰生产产值完全空白。著名的潮州金漆木雕艺人们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受到批斗。为了企业的生存，艺人们只能生产现代题材如“五谷丰登”、“保卫家乡”等不易销售的产品，由于外贸指令生产，结果造成仓库积压。潮州工艺美术彩瓷器这时也因题材多属“四旧”范畴，生产走入低潮。

文革前期，面对潮州工艺美术行业的严峻形势，作为行业的专门管理机构——潮州工艺美术公司束手无策，尽管由二轻局副局长兼任工艺公司经理，结果也回天无力，至1968年公司终于瘫痪撤销。工艺美术行业的管理权力转入潮州二轻革命委员会生产组。

针对当时整个二轻工业不景气的状况，生产组采取了“政治并厂”、“关停并转”的做法，工艺企业有的转产，有的分出部分力量投入当时淹没全城的电子产品试制中。一时间，潮州工艺美术企业如深秋梧桐，满树枯叶，随风飘零……

二、在有利形势中恢复发展。

“四人帮”全面破坏国民经济，出口贸易急剧下降，工艺美术行业遭受破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971—1972年间，针对这一情况，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多次作了有关的指示，再次强调组织出口传统工艺美术品。1972年4月，周总理在接见广交会的代表时又强调：“……这些东西没有人能与我们竞争嘛，但是，都被极左思潮打掉了。手工艺要大提倡……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手工艺大有前途，应该把它搞上去。”当年年底，国务院

批示同意轻工业部《关于加强工艺美术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成立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1973年4月21日，国务院以国发〔1973〕46号文批转轻工业部、外贸部于1972年12月上报的报告，文件指示：“发展工艺美术生产，不仅为丰富国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所需要，而且是扩大贸易出口，换取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大力增加生产。”国务院还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工艺美术工作的领导，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管理机构，要认真总结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经验，进一步落实党对老艺人、创作设计人员的政策，继续做好工艺美术企业和人员的归队工作，并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这一带有纲领性的文件有力地扭转了“四人帮”干扰破坏工艺美术生产的形势。鉴于自1971年起渐渐出现的良好气候，1972年，潮安二轻局成立工艺组，对县属各工艺美术生产企业实行归口管理；潮州二轻局也决定恢复工艺美术研究所，并于当年以考试形式招收潮州300名待业青年，由研究所采用半工半读形式，开展美术基础和特种工艺美术基础技术培训。此举为补充潮州文革前期人才流失、扩大生产，以至后来为潮州工艺事业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

形势的发展使潮州工艺行业成员越来越多，行业管理机构的成立逼在眉睫。1974年，潮州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得到恢复。为扭转文革前期由于工艺企业关停并转所带来的生产萎缩被动落后局面，工艺美术工业公司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将潮州工艺美术工业生产又向前推了一步：一是扶植传统工艺美术项目，尽快恢复生产（如潮绣厂的潮绣戏服产品）；二是将原已并入非工艺美术行业的企业（成为车间）独立出来（如绣衣厂、金漆木雕厂等），恢复原来建制，继续发展传统产品；三是将大厂按门类品种拆开独立建厂（如银饰厂、机绣厂）。

正当国内工艺美术生产和出口在恢复中渐渐发展的时候，1973年6月，“四人帮”又借助出口国画问题制造事端，企图阻挠

破坏工艺美术行业贯彻执行国务院〔1973〕46号文件。1974年又借“批林批孔”之机，把工艺美术说成是“复辟倒退”、“文艺黑线回潮”，使刚刚恢复的工艺美术生产再次惨遭破坏。传统题材又被列为禁区，神佛、古装仕女等题材的工艺美术品都不能生产。雕塑、画类、首饰等行业的生产急剧下降，丢掉了传统市场。加上1974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国际市场经济大萧条，这对潮州工艺美术行业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有鉴于此，潮州工艺美术工业公司贯彻省工艺公司“内外销结合、两条腿走路”精神，促进企业发展内销工艺旅游品生产。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国经济形势一新。为适应这种新形势，各企业适当配备人才，加强创作设计队伍建设，有条件的企业，开始进行工艺美术技术改造，以促进生产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的进程。潮绣厂色丝绒原从外地购进，色阶单调，表现力不丰富，厂组成染绒小组进行攻关，得到省厅拨款支持。潮州竹制品工艺厂则学习国内外胶合新技术，研制成功名扬一时的胶合竹盘，为潮州工艺美术工业增添了一个新品种。

文革后期，尽管极“左”路线不时进行干扰，潮州工艺美术生产毕竟还是有所增长。（见附表）

1974年—1976年潮州工艺美术工业公司概况一览表

项目 年份	企业 个数	职工 总数	工业 总产值 (万元)	全员劳动 生产率 (元/人)	利润 总额 (万元)	盈利 企业	亏损 总额 (万元)	亏损 企业
74年	10	2503人	793.06	3168	76.25	9	1.38	1
75年	8	1813人	969.18	5375	41.78	8		
76年	8	1855人	1390.65	7517	(缺)			

说明：县镇企业欠缺资料无列入。

第二节 创新工作的阻滞和崛起

六十年代中期，潮州工艺美术企业中普遍还没有形成创作设计队伍，只有极少数美术基础较好的青年和民间老艺人在发挥作用。培养创作设计人才的希望寄托在潮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和潮州工艺美术职业学校。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工艺学校连同潮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一并宣告下马，绝大部分人员分配到企业生产。潮州工艺美术创作设计队伍尚未形成，即在文革大风浪中船沉人散。

传统产品不能生产，传统题材不能沾边，对于老一辈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艺人没有地位，有的被扣上“黑线人物”帽子靠边站，有的则被迫从事与本人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科研项目，既浪费了企业的钱财，也浪费了艺人的生命和旺盛的艺术创作精力。

形势不利工艺美术创作活动，老艺人和年轻设计师们，或转行，或靠边站，使潮州工艺美术创新工作停滞不前。这景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期。

自1971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周总理和国务院领导对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生产的重视，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得到了相应的抵制。国家为扩大出口贸易，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传统工艺美术生产又开始复苏，艺人们被压抑多年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自此，创作活动比较活跃，尤其是金银首饰、金木雕、特种工艺和玉雕企业的艺人和技师表现尤为突出。1971年，由木雕老艺人张连昌、技艺人张镇洲精心制作的“双凤朝牡丹”赴法国展览。1972年，为迎接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召开，艺人们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刚恢复的工艺美术研究所，艺人和设计师们渐渐归队，上下积极创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艺人杨雪友创作的《香包花篮吊坠》；叶天津设计的剪纸《女民兵》；胡汉铭设计的机绣《激扬文字》；林汉臣

设计制作的麦秆《竹》和许锡奎制作的银饰品《金鱼》等，他们的创作热情影响和鼓舞着更多的工艺美术创作设计者。金木雕老艺人张鉴轩于 1972 年 7 月去世前，还精心设计制作金木雕“蟹篓”，后与艺人陈舜羌创作的“虾篓”一起送阿尔及利亚展出；1974 年，木雕老艺人刘林德、技艺人员温贻仁制作的“狮球”赴塞浦路斯展出；金银首饰厂艺人许锡奎及其高足吴泽长也大显身手，精心制作了国家外贸部门下达的札伊尔蒙博托总统定制的 31 套银质高档酒具，作品所达到的技艺术水平博得了省、地区外贸部门及同行的赞赏。师徒俩还首创本省金银首饰摆件新品种。在初期制作《花丝开窗戏游瓶》、《双层花丝浮雕双龙瓶》后，又借鉴开元寺明代文物《龙凤铜鼎》的艺术造型，创制《九龙宝鼎》。作品吸收北京九龙壁群龙各异的造型精华，融汇潮州金银首饰多种技艺进行精心表现，创作过程共花了一年多时间。作品完成后即受到专家及同行的大力肯定，订货经久不衰。在粉碎“四人帮”后，该作品被认为是广东省金银首饰的代表作，多次刊登于专刊封面，获省艺代会评比一等奖并多次赴香港、伦敦、巴黎等地展出，受到外国友人的高度赞赏。1982 年泰国以《十四 K 九龙宝鼎最抢眼》为题，图文并茂予以报导，并高度肯定了许锡奎师徒的技艺成就。《九龙宝鼎》已成为潮州金银首饰业的骄傲。

为企业生产发展创制新产品，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提供展礼品和为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1972 年 9 月 3 日至 1973 年 1 月 27 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提供展品的一系列活动，鼓舞、调动了创作设计人员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使潮州工艺美术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了起色，也为潮州工艺美术史留下了一小批珍品。

1972 年至 1973 年，潮州麦秆画技艺人员曾经培养了来自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工艺美术技艺人员，艺人成为直接传播国际友谊的文化使者。

自1972年工艺美术研究所恢复建制之后，培训技术人员工作又重新走上正轨。除了300名半工半读学生外，每年还由企业选送有美术基础的工人或技术人员到研究所进行专业培训，提高设计造型能力，然后再回到企业中。企业也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开展培训活动，以增强企业及成员的素质，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为了扩大潮州工艺美术知名度，公司发动组织了麦秆贴画、金木雕、潮绣、金银首饰等十大门类展品1300多件，于1976年1月23日至5月20日，与广州文化公园联合举办“潮州工艺美术展览”。展览会占地面积800平方米，接待观众达60余万人次之多。潮州工艺美术精湛的制作技艺和别具地方特色的传统产品深深地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广州各家报纸、电台纷纷派记者采访并作专题述评。这是对潮州工艺美术创新设计队伍及其行业技术阵容的一次大检阅，而潮州工艺美术队伍在大都市的轰动效应中则更加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几位著名老艺人（花灯艺人林乐笙，金木雕艺人张鉴轩，金银首饰艺人刘元，潮绣艺人魏逸依）先后谢世，这是潮州工艺美术行业的重大损失。他们的业绩常常引起后人深深的怀念。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终生积累的经验，已通过父子、师徒的传承纽带注入新一代艺人的血液之中，化作促进潮州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无穷力量。这是老艺人们的光荣。

第三节 工艺美术企业概况

①地方国营潮州潮绣厂（现名：地方国营潮州市潮绣厂）

潮绣厂主要产品在文革中被视为“四旧”禁止生产。为谋求出路，厂于1968年、1969年分两批搞人棉格布生产和组建人纤加工厂，又于1970年抽调60名工人搞单晶硅（其中45名职工和电子设备于1973年与电线厂合并成立电器厂，借用厂房，后独立搬出）。正在山穷水尽之时，1970年底厂争取到省丝绸进出口公司棉

衣斗篷生产任务。为此，厂重整布局，派 10 名职工到广州南方服装厂学习，又调回艺人林智成等一批搞人造纤维的人员，为棉衣斗篷生产投入主要精力，使该产品渐渐发展为厂的一大品种，成为潮汕地区生产梅花牌棉衣的第一家工厂。当时产品主要是男女棉衣、背心，男童棉衣、背心。投产第一年产值即达 15 万元。

1972 年，国内出现了有利传统工艺美术发展的形势，厂一方面争取省二轻厅科技处同意“潮绣色丝绒染色工艺科研项目”立项并拨给经费；一方面争取政府有关部门解决办事处绣花女工转为集体工人待遇。潮州绣花女工历来福利待遇差，在潮绣生产停滞时大批绣工转行，恢复生产出口海外之后，常因绣工缺乏影响生产货期。潮州党政和工业主管部门有鉴于此，通过调查了解，积极采取措施，于 1976 年将潮州五个办事处的 540 名绣工收拢，转为集体工，划归潮绣厂管理，形成了“国营带集体”的新型经济形式。由于市内绣工不足，厂又发展了江东、磷溪、意溪等绣花工区，使潮绣绣花工力量逐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②地方国营潮州丝衣厂（现名：地方国营潮州市丝衣厂）

造反派给“水仙花”牌绣衣定下“崇洋媚外”，“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罪名将其一棍子打死。丝衣厂渐渐缺粮断炊，处境日趋困难。1970 年，在工业部门的引导下，厂选派技术人员到外地学习，试制成功半导体硅整流二极管。厂于 1971 年挂牌，成立潮州无线电厂。1973 年，丝衣生产下马，二轻局将 35 名绣衣技术骨干调入国营潮绣厂。

③潮州绣衣厂（现名：潮州市二轻绣衣厂）

起步艰难的绣衣厂本来日子就不好过，在外贸部门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厂于 1968 年 8 月停止生产。为了解决企业出路，二轻局调走厂部分职工，与二轻纺织品厂于 1969 年合并，生产蚊帐、手巾、木纱团。1972 年末到 1973 年初，出口贸易渐渐恢复，绣衣厂与纺织品厂拆开，恢复绣衣车缝和洗烫生产。因生产中断数年，

原来部分设备调出抵还各兄弟厂欠债。仅存的 29 部破旧华南牌缝衣车中，有 15 部还是兄弟厂借给的。为解决生产设备，厂组织技工尽力维修旧车，使其可以勉强投入使用；又贷款购进缝衣车 70 部，还动员厂外工自带缝衣车 60 部。其时，虽有生产任务，但停停打打。洗熨车间除洗熨本厂产品外，也对外加工。由于近郊洗熨厂兴起，外加工任务也大大减少。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欠省厅基建贷款 14 万元长期无法偿还。这种在亏损的困难中寻求发展的状况，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④潮州机绣厂（现名：潮州市二轻机绣一厂）

1969 年 8 月，因政治并厂，该厂成为潮州二轻工艺厂机绣车间。1970 年 4 月，产品归口由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厂培养了 4 名机绣设计人员，开始创新花色品种。1971 年送样参加第 30 届广交会，部分样品获得客户订货。1972 年 8 月，潮州机绣厂恢复旧称，从工艺厂拆出，职工达到 190 人左右。后以原厂房为基础扩建混凝土结构的机绣车间一座（建筑面积 275 平方米），暂时缓和了厂房紧张局面。

⑤潮安意溪抽纱社（现名：潮州市二轻潮安第二机绣厂）

绣花女工既有集中又有分散。自外贸出口处于停顿状态后，由抽纱公司和绣衣企业投放的绣花工件明显减少，在停停打打中，抽纱社于 1975 年划归意溪镇领导。绣工虽有 650 人，但当年加工值只有 4—5 万元，年利润只有 0.7—0.8 万元。

⑥潮安意溪被服社（现名：潮州市二轻潮安绣衣服装厂）

1966 年至 1976 年，这家只有 14 名职工的生产社，只作为当地加工棉被和服装的企业不死不活地生存着，人员也一直没有变动，生产没有发展。

⑦潮安庵埠抽纱社（现名：潮州市二轻潮安抽纱厂）

在抽纱出口贸易受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社生产几乎停歇。为解决劳力出路，部分职工组成五金组，生产铁钉、煤油炉等五金

产品。1975年11月，五金社拆出独立。厂房借给镇工业办公室。1976年，因发展勾针编结工艺，抽纱生产才略有起色。

⑧潮安金漆木雕厂（现名：潮州市二轻金漆木雕厂）

文化大革命前期，因传统题材成为“禁区”，木雕社只能生产以“五谷丰登”和反映工农兵形象题材产品，外贸部门按指令性计划给予收购。这类产品海外缺乏市场，造成外贸和生产社双头积压，生产社生产处于奄奄一息之中。1969年，潮州木雕社并入潮州木器厂，成为金木雕车间。木雕艺人只做日用家私配套雕刻，有的则调动工种，改行当木工。1972年，国家外贸出口及工艺生产形势好转，传统金木雕生产停歇数年，海外需求量激增。10月，潮州金木雕车间从木器厂拆出建厂，职工在原85人基础上，又于1973年接收研究所培训的120名艺徒，投入外贸订货的“大路货”生产。一直至文革结束前，年年产值20多万元。这一时期是金木雕厂建厂以来的黄金时代。

⑨潮州银饰厂（现名：潮州市二轻金银饰品厂）

金银首饰生产计划，历来为外贸部门下达，并按计划领料加工。进入文革后，生产任务一年比一年减少。为寻找出路，厂将部分工序改为生产单车配件。不久，改名单车配件厂，全厂250名职工。1966年10月，二轻局将66名熟悉首饰专业制作技艺的职工和一部分破旧设备并入潮州工艺厂，成为金银首饰生产车间。1972年底，随体制变动从工艺厂拆出成立潮州金银饰品厂。自1973年起，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使传统首饰生产走上正轨。艺人许锡奎等配合省、地区外贸，生产一批高档金银工艺日用、装饰摆件，既为厂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又在国外市场和工艺展览中为潮州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到1976年，全厂产值从1972年的7.64万元上升到35.7万元。潮州银饰厂在小城一时成为令人注目的企业。

⑩潮安首饰工艺厂（现名：潮州市二轻潮安首饰工艺厂）

1971年，庵埠农机配件厂银饰车间的翁子明师傅创制的熊猫别针获得外贸部门肯定，订单随后而至，当年完成加工值5万元。工人60多人，月平均工资30元；1973年3月，银饰车间从农机厂拆出，成立潮安首饰工艺厂。翁子明师傅等技艺人员推出一批立体摆件银通花瓶和奖杯，还有图案别针，当年完成出口加工值6万多元，并从外贸贷款基建厂房、增加设备，也增强了企业职工的信心。厂有职工71名，平均月工资35元。1975年，是厂金银摆件的生产黄金时期，孔雀银瓶、仿唐熏珠、鱼龙宣炉及活动鱼、仕女挂屏等连同首饰加工，创出口总值12万元。厂又发展内销产品铜镀金首饰，旅游纪念章、铜镜等，销路看好。内外销销售合计20万元。工人工资月平均40元。

⑪、⑫潮州工艺厂（现名：潮州市二轻特种工艺总厂）

1969年10月，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中，特种工艺社与机绣社，剪纸绣品社和银饰社合并成为潮州二轻工艺厂，厂部设在东平路62号，分为麦秆、香包、机绣、银饰四个车间。

1972年，拆出银饰、机绣，厂主要产品麦秆、香包两大类。1969年，艺人沈金焰研制成功立体盒类和麦秆小吊件产品；张家泰创制国画乔其纱灯罩；叶天津创制绣贴画。新品种的出现使厂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1972和1973年，根据中外文化交流协定，阿尔巴尼亚、越南先后派遣技术人员到厂参观、学习。在师傅们无私传授下，他们认真学习，将潮州麦秆工艺制作技术带回自己国家去发展传播。这事一时成为潮州美谈。

⑬火药厂（现名：潮州烟花爆竹厂）

文革初期，技艺人员瞄准市场，试制成功纸制练习手榴弹等二十多种军训用品，受到部队和民兵的好评，产品销售省内外。远至四川、甘肃等十多个省，其中伞兵靶还曾参加全国表演，赠送外宾。

七十年代初期，厂贯彻当时“地方工业要为农业服务”的方针，因陋就简试制投产硝铵炸药，并逐步实现生产机械化。炸药年产量达到四百多吨，主要供应本地区各县市农田基本建设。为方便推销产品，改名火药厂。烟花爆竹生产，每年均有增长。

⑭潮州二轻纺织品厂

1966年末，餐帘织品社进行生产设备改革，将原来手拉织布机改为铁木结构电动织布机。帐布、手帕产品质量稳定，工效提高一倍多。

1968年，为适应形势发展及推销产品需要，经二轻局批准，改名为潮州二轻纺织品厂，仍生产竹餐帘出口。

1969年，纺织品厂与二轻绣衣厂合并，除织蚊帐布外，还生产竹餐帘和木纱团。

1973年，纺织品厂与绣衣厂拆开，继续生产竹餐帘出口和内销帐布、手帕。生产正常，分成两个专业车间管理。

⑮潮安意溪竹器厂（现名：潮州市二轻潮安竹器工艺厂）

1969年“政治并厂”时与意溪竹杂厂合并，成为竹器车间。

1972年拆开，为意溪竹器厂。鉴于生产竹农具经济效益低，为发展新产品，经外贸牵线帮助，得到东风李厝竹器厂的技术指导，厂开始生产“竹签船”等竹编工艺品出口。此后不断创新，使产销年年有所发展。产品有竹草编织品、竹荔枝芯编织品、大竹扇等10多个品种，几百个花色。仅SB2—B4、5、6三头茶厘一项，1973年出口3万多支，1976年增加到40多万支。竹草（荔枝芯）篮、大竹扇等品种都是出口热销货，多年来经久不衰。

⑯潮州竹器厂（现名：潮州市二轻竹器厂）

1969年，潮州竹器一社、二社、竹篷社、厘竹社重新组建竹器厂，工人600多人。为寻求新的生产出路，厂抽调部分干部职工发展电子产品，1970年拆出无线电元件一厂。

1971年，为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厂技术组改革金锯成功，将